

甲午战争与中华民族的新觉醒

吴 剑 杰

甲午战争前,中国经历过多次对外战争。战败的刺激,促使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睁眼看世界,提出和发展了学习西方长技以维护中国传统封建政制的思想主张,“中体西用”成为甲午以前的主要思想潮流。甲午一役的深创巨痛和强烈冲击,激发了全民族的忧患意识和救亡图存的真正觉醒,改变了人们只在封建传统中谋求发展的思维定势,摒弃“中体西用”的教条,中国思想界和民族意识才真正发生从古代传统向近代的转变。甲午以后10余年间兴起的维新变法和民主革命思潮,目的都在于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政制实行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造和重构。维新和革命都失败了,中国人继续艰苦探寻最能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共和制道路的模式,并终于找到了这种模式,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甲午战争是开启这一漫长过程的契机。

1894年(农历甲午年)7月25日,集结于朝鲜牙山口外丰岛海面的日本海军舰队向清朝中国运兵船队发动突然袭击,同时偷袭根据中朝两国协议驻扎于牙山的清军,发起对华作战。8月1日,清政府被迫对日宣战,中日甲午战争爆发。9月16日,两国海军主力舰队在鸭绿江口外的黄海海域发生激战,清朝北洋水师在损失五艘战舰后退避山东威海港。10月,日军大举入侵中国辽东,连占安东、凤城、宽甸、海城、大连、旅顺。1895年1月中旬,日本海陆军进围威海,北洋水师全军覆灭。4月17日,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分别代表中日两国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和约,历时近8个月的中日甲午之战以清朝中国的失败而告结束。

这次战争是日本蓄意挑起的。早在日本明治维新初期,日本政府便确定了首先征服朝鲜继而征服中国的北进计划。1887年,日本加紧了武力吞并朝鲜和侵华战争的步骤,制订了《征讨清国策》,提出“以五年为期,作好准备,抓住时机,发动进攻”的备战方针。1893年4月,日本自以为羽翼丰满,决定组成战时大本营,负责策划和指挥日军侵华战争。1894年1月,朝鲜发生东学党领导的反政府起义,日本便以保护在朝日侨为名,派遣万余名陆军和几乎全部海军侵入朝鲜南部,占领首都汉城及一些重要据点,并密令驻朝日使务必想尽办法,制造对华开战的借口,首先驱逐驻朝清军,割断中朝间悠久的传统联系,独占朝鲜,进而侵入中国,取得与英法德俄等西方列强争夺中国霸权的优势地位。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猖狂进攻,中国政府奋起抵抗,虽然由于战争指导者的错误决策而终于失败,但中国军民在战争中所表现的反抗外侮、宁死不屈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令人振奋;战争所引起的强烈震荡和由此而造成的中华民族的真正觉醒,难以忘怀。这正是我们在今天仍然需要重温这段历史的价值之所在。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经历过 1840 年和 1856 年发生的两次鸦片战争以及 1884 发生的中法战争。战争的结果一方面是西方殖民者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迫使闭关自守的封建中国逐步打开大门,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另一方面也促使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睁眼看世界,目睹和承认西方在武器和百工技艺方面所拥有的优势,认识到中西间的通商交往是“天运使然”的历史趋势,“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束手而不问”;也注意到西方各国有其迥异于中国传统的文明和价值观,并非“蛮夷之邦”,于是有“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的提出。但同时又坚信,“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不必也不能作任何根本性的变动。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引进和利用某些西方国家的物质文明(主要是坚船利炮之类),来维护和强固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和纲常名教的统治地位,成为甲午以前的主要思想潮流。至于上层统治者则依然苟且偷安,文恬武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内外人情,皆酣嬉偷惰,苟安旦夕,上下拱手,游宴从容,事无大小,无一能举,有心者叹息而无所为计,无耻者嗜利而借以营私,大厦将倾而处堂为安,积火将燃而寝薪为乐,所谓安其危而利其灾者”^①。一般下层民众更属迷懵,“茶坊酒肆,亦大书‘免谈国事’,俨有诗书偶语之禁”。总之,多次战争所带来的冲击力,都不足以使中国统治者和全民族真正惊醒思变,即使是极少数先进的人们,也仅仅认为传统的封建统治机器只需加上洋式的利爪或稍作修补,仍然可以照旧统治下去,那时,不仅西方再不敢蔑视中华,甚至会畏惧中国,向中国学习。

甲午一战的强烈冲击才彻底打破中国朝野的这种自慰自大的心理,促使整个民族真正觉醒并思考中国的出路何在。战争失败得如此之速之惨,而且是败于一个曾经被清朝视为蕞尔蛮荒的岛国日本;条约又是如此苛辱,赔款高达 2 万万两,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等大片国土,这又直接刺激了西方列强的侵略欲望,迅速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民族危机。“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谭嗣同诗句)、“满腔都是血泪,无处著悲歌”(梁启超诗句)。甲午战败的深创巨痛,造成普天同愤,士民悲泣,朝野震惊,激发了全民族的忧患意识和救亡图存的新觉悟,改变了先进的人们只在封建传统中谋求发展的思维定势,摒弃“中体西用”的教条。他们进而探求战争失败的原因,对标榜“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进行尖锐批判,指斥洋务派的“师夷”是“得其貌,失其真,慕其名,忘其实”,于“整顿之法,救弊之方”懵然无知,但“为享富贵贻子孙之计”;长期主持洋务新政和甲午战事经手签定《马关条约》的李鸿章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弹劾他的奏章如雪片纷飞,连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斥其“昏迷”,李的女婿张佩纶则说他“晚年为贪诈所使,七颠八倒,一误再误,致使四十年之勋名威望,一旦为倭约丧尽”^②。有人甚至说,对李鸿章“国人皆曰可杀,万口一词,应立加罢斥,以儆奸邪”。李鸿章曾代表清政府经手签订过不计其数的卖国条约,但从未如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后遭到这样举国一致的猛烈抨击。这一事实表明,由李鸿章倡导的通过办洋务使中国渐臻富强的思想和道路的破灭。人们开始谋求新的出路,“于是慷慨爱国之士渐起,谋保国之策者所在多有”,或主张效法日俄维新变法,实行君主立宪以自强,或主张效法美法革命,推翻清朝封建专制、实现民主共和以振兴中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诚如梁启超所言:“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③这是因为,由于甲午一役的激刺,中国思想界和民族意识才真正发生从古代传统向近代的转变,人们不再认为祖宗传下来的典章制度、纲常名教都是那么美轮美奂,或者稍作修补便可万世长存;必须对它进行资本主义性质的根本的改造和重构,中

国才有自存自立的希望。顽固守旧的人不是没有,但不能阻挡甲午以后并兴迭起的变法和革命新思潮的蓬勃发展。

二

康有为是维新变法思想的倡导者。早在1888年,他就上书清朝光绪帝,提出变更成法的主张,虽然只是要求皇帝“但变六朝、唐、宋、元、明之弊政而采用周、汉之法意”,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维新,但除了他的几位弟子,一般官僚士人都视为离经叛道、怪异狂妄之论,不敢附和。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签订前后,他连续三次上书光绪皇帝,其中包括得到1300名晋京应试举人赞同或签名的《公车上书》。在这几次上书中,康有为指出日占台湾后各国以中国之可欺而狡焉思逞、中国亡国无日的严峻现实,提出朝廷“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的维新总方针,主张设议院以通下情,变革科举、开府辟士以求贤才,改革钞法、大兴近代工交事业以增强国力,务农劝工、惠商恤贫以培民本,广设学堂以开民智。他严厉批评甲午以前喧嚣30余年的洋务新政只是“补苴罅漏,弥缝缺失”之举,没有触及根本,而“根本不净,百事皆非,故有海军而不知驾驶,有使馆而未储使才,有水师堂洋操而无精卒,有制造局船厂而器无新制,有总署而不通外国掌故,有商局而不能外国驰驱,……故徒糜巨款,无救危败”^④,主张“尽弃旧习,再立堂构”,即实行资本主义性质的根本变革。他忠告清朝皇帝,日本的土地人民不及中国的十分之一,然而明治维新后国势骤强;中国当借甲午新败后雷霆霹雳之气,造立天地之功,卧薪尝胆,扫除更张,如此,“三年则规模已成,十年则治化大定,然后恢复旧壤,大雪仇耻”,否则,“虽有起死之方,无救庸医之误”,中国将陷于亡国灭种、万劫不复的苦难深渊。

康有为的这几次上书,虽然暂时未能推动光绪帝决心变法,但他的变法图存的思想理论代表了甲午以后一般士民和少数开明官员的共同心声,反映了时代的进步要求,他的《公车上书》不径而起,在民间广为传抄。此后,“要救国,只有维新”的爱国思潮弥漫全国,维新团体和报刊宣传方兴未艾。“时四方新学士子喜康梁之议论新颖,群相呼应,起而组织学会讨论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⑤康有为成为当时思想界的领袖,他的思想理论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启发和推动着人们走上维新救国的道路。如出身官僚家庭的谭嗣同是从甲午战败“经此创巨痛深”之后,才决心追随康有为走上“尽变西法”的维新道路,并成为著名的维新思想宣传家和实践者的;身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的严复是因甲午战败而“腐心切齿”,决心致力于译述《天演论》等西方政治学说以警世的;甲午年殿试状元张謇是“愤于政府昏聩”,辱国丧权而摒弃仕途转而决心兴办实业、教育以救国的;民族资本家经元善因战争失败而“腐心疾首,愤不能泄”,进而主张变法自强;张之洞的幕僚汪康年在战后“洞明时事,知非变法不足以自存”,开始从事维新宣传,主张“将教育、政治一切经国家、治人民之大经大法改弦易辙”;正在杭州埋首“稽古之学”的章太炎也是从这时转向学习西书西理,投身维新政治活动的;就连僻处湖北农村小镇的青年学子张难先也是在甲午战后为康梁思想所感召,从而开始“究心当时之务”的。战争的失败及其后果如此强烈地震撼了各阶层不同年龄层次的中国人,甚至光绪帝也意识到“非变法不能立国”,隐然有改革之志。1895年,康有为为“广联人才,创通风气”而在北京、上海创设强学会,列名会籍、参与或支持会务的不仅有一般京官文廷式、沈曾植、陈炽、杨锐、张权等,还有军机大臣、大学士、尚书、侍郎如翁同龢、孙家鼐、李鸿藻、张荫桓和地方总督王文韶、刘坤一、张之洞等大员。这些人虽然并不完全赞同康有为的思想主张,后来的政治态度也各有变化,但因甲午战争惨败而不

满于清朝现状、追求救亡图存的认识是共同的。战争教育了人们,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甲午以后,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思想迅猛发展,只短短3年,便发展成为戊戌百日维新的政治改革运动。这次依靠皇帝实行自上而下的和平改革实践虽然失败了,但作为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推动着先进的中国人继续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许多曾经追随康有为的人们逐渐放弃和平变革的维新主张,进而接受同在甲午战后趋于活跃的武装反清的革命思想,成为孙中山的同志。

三

孙中山虽然自称早在1884年中法战争时即有倾覆清朝之志,但直到甲午战前,他仍然是一个改良思想占主导地位的爱国者。甲午战争爆发的1894年6月,他专程北上天津,向主持战事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上书,提出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政治主张,希望这位权势显赫的汉族官僚出而主持“仿行西法以筹自强”。但李鸿章拒绝接见他,对上书中的各项建议也不作任何表示。上书受挫和中国对日作战的失利,使孙中山“怆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渐积而知和平之手段不能不稍易以强迫”^⑥。他最后放弃维新改良的和平幻想,坚定地走上了武装反清的革命道路。这一年11月,孙中山发起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团体兴中会。他在亲手制订的章程中说:“近之辱国丧师,翦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列邦,文物衣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愤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⑦。字里行间,洋溢着对祖国前途命运的忧患和对误国残民的清政府的仇恨。为振兴中华,发奋为雄,他号召推翻“因循苟且,粉饰虚张”的庸奴清朝统治者,建立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共和国,并立即着手策划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同在甲午以后勃然兴起的康有为维新改良思想比较而言,无疑具有超前的性质,不可能马上得到刚刚从“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的一般士民的理解和认同。尽管他的宣传组织活动尚处在秘密状态,他的名字仍因广州起义的失败而为世人所知,结果是“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⑧。但是,他的革命思想真正代表着时代前进的方向,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戊戌变法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性质的政治实践,尽管它非常温和与不彻底,仍然为西太后所代表的顽固势力所不容,她将维新志士投入血泊里,将支持变法的光绪帝予以软禁。变法的失败,向国人表明不可能通过清政府的自我变革达到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目的;清朝廷已无可救药,想要依靠它效法日本明治维新使中国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是徒劳的。除了康有为、梁启超等极少数不愿忘记光绪帝的知遇之恩,继续坚持保皇立场外,许多曾经追随康梁、信仰改良主义的人们,逐渐从怀疑、动摇到离异,甚至宣布与康、梁绝交,转而信仰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也只有短短几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迅速取代维新改良思想而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连改良派也不得不承认:“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此革命党之势力所以如决江河,沛然而莫之能御也”^⑨。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理论纲领的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反清武装起义运动的不断发展,终于导致1911年全国性革命高潮的到来,使延续近两千年的封建帝制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寿终正寝。当然这次大革命的积极成果只是赶跑了皇帝,结束了君主专制,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况并没有马上发生根本

的改变,变相的和伪装的大小独裁者层出不穷,甚至出现过袁世凯称帝和宣统复辟这样的闹剧,但都因违拂民意而归于败灭,因为民主共和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任何重温皇帝旧梦的倒行逆施都必然遭到国人的反对和唾弃。这是人们思想观念方面发生的多么深刻而巨大的变化!中国人在以皇权为象征的专制统治下生活了几千年,皇帝被尊为“天子”,皇帝就是国家,神圣而不可侵犯。其间,虽然也有过海瑞骂皇帝一类故事和黄宗羲“攻君之过”的激烈言论,但直到甲午战争以前,谁也不敢设想没有了皇帝中国还能成其为国家。甲午一战的强烈刺激,使中国人如大梦初醒,正是皇帝的专制统治造成中国的积贫积弱,国将不国。皇帝必须改造成为日本明治天皇那样的实行资本主义的皇帝,而不再是传统的封建皇帝,或者干脆将其推翻。这一切,都在短短的10余年间发生了。虽然历史注定中国人还要在黑暗中继续艰苦地摸索,但那是在探寻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共和制的模式,并且终于找到了这种模式,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这一从传统到现代的过程是漫长的,而甲午战争则是开启这一过程的契机。

甲午战后一百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着战后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全民族的新觉醒,在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思想舆论的推动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近代教育事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后来又在辛亥革命后的几年间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队伍也随之成熟壮大,他们是甲午以后各种进步思潮的阶级基础和主要传播者。中华民族永远铭记甲午战败赔款割地的屈辱,不忘国耻,发愤为雄。当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日本因攫取相当其年财政收入5倍^⑨之巨的甲午赔款而迅速强大,并于本世纪30年代发动了灭亡中国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再一次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关头,中国政府和人民团结奋起,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过8年艰苦抗日战争,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无数次反帝斗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并进而取得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至此,自甲午以后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才得以最终解除,中国人民才有了按照自己的选择治理和建设国家的独立自主的国内外环境。在实行改革开放、建设现代化强大国家的今天,我们纪念甲午战争一百周年,不仅仅是要缅怀在那次战争中为国捐躯的爱国将士和战后为探寻救国救民真理而献身的志士仁人,更要牢记落后就会挨打的历史教训,肩负起建设和保卫强大祖国的历史使命,使过去的屈辱永远不再重演,也决不会重演。

注 释:

- ① 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1888年)》,载《康有为政论选》上册,第55页。
- ② 《中日战争》资料第5册,第229—230页。
- ③ 《戊戌变法》资料第1册,第249页。
- ④ 《康有为政论选》上册,第152页。
- ⑤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23页。
- ⑥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2页。
- ⑦ 《孙中山选集》,第14页。
- ⑧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35页。
- ⑨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第607—608页。
- ⑩ 甲午战争时,日本政府的财政收入每年约8千万日元。《马关条约》强迫清政府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加上所谓“赎辽费”3千万两,共2亿3千万两白银,约合4亿日元。

(责任编辑 吴友法)